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晚清海权问题研究述评

李 强 华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学界对于晚清海权问题的研究集中于嬗变历程、制约因素、对海防成败的影响以及典型人物海权思想和实践等方面, 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依然存在论题模糊、研判标准唯西方化、研究方法单一以及对现实关切不足等缺憾。未来关于晚清海权问题的研究需要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四重转型”背景下重构晚清海权战略嬗变历程、以“过程—事件”分析法聚焦核心论题的探讨, 并深入挖掘晚清海权战略的得失成败对我国未来海权发展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晚清; 海权; 20 世纪 90 年代; 述评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2)03-0025-0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学界关于晚清海权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十多年前史春林对 1990 年至 2009 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1], 从该文发表到今天又过去了十余年, 在此期间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在当前我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对三十年来晚清海权问题研究成果作进一步总结, 以期有助于该项研究在未来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一、关于现代中国海权概念界定问题的争论

晚清海权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内涵各异, 既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权概念, 也有别于西方近代海权的概念, 只有按照晚清海权内涵自身演变的逻辑去认知和评判, 才符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认知原则, 以避免“范畴错置”的错误。为了清晰地认知晚清海权, 必须对现代话语体系里的中国海权概念加以界定, 以避免“古今”海权概念的混用。

(一) 与海权相关的概念

近代以来, 随着世界海权理论与实践的演变, 海权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得以扩展, 至少涉及到海洋权力、海洋权利、海洋权益、海上力量、制海权等。首先, 何谓海洋权力。作为政治学术语的海洋权力包括海上霸权与合法控制海洋以实现正当

海洋利益两类。张文木认为作为一种强制力量, 海上权力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 否则就是海上霸权^{[2]14}。孙璐认为作为维护海洋权益重要手段的现代海洋权力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而对他国影响的能力^[3]。其次, 何谓海洋权利与海洋权益。张文木认为海洋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 中国的海洋权利意识包括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 前者包括国际法等法律法规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 后者包括各种海洋利益^{[2]7}。关于海洋权益, 《海军大辞典》用英文 oceanic right and interest 来解释, 实际上涵盖了权利和利益两部分, 包括主权不受侵犯、对毗连区等进行管辖与勘探、实施海洋交通运输和军事行动以及公海海床等资源开发利用和科学考察等的权利^{[4]9}。再次, 何谓海上力量。张文木认为海上力量是维护海上权利的手段, 包括由作战舰船和武器、辅助舰船等组成的军事力量与商船、基地和以训练有素的人员等组成的非军事力量^{[5]167}。最后, 何谓制海权。作为军事学术语的制海权是近代西方海权的最初含义, 指交战一方依靠海上优势在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洋区域所取得的控制权, 目的是使己方兵力获得行动自由而使敌方行动受到限制或失去行动自由^{[4]8}。总之, 制海权、海上力量、海洋权力的使用可以是正义

收稿日期:2020-10-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晚清海权战略研究”(18YJAZH045)

作者简介: 李强华(1975—), 男, 安徽寿县人, 哲学博士,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的,也可以是非正义的,如果用来维护一国具有合法性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的手段,那么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其自身内涵着正义性。

(二)关于现代中国海权概念的界定

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上述与海权相关的概念究竟哪个能够反映现代中国海权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不同学者看法各异,于是产生了对现代中国海权概念界定的分歧。

首先,把海权界定为海洋权力。马汉认为狭义的海权就是通过控制海洋以确保本国获得巨大利益;广义的海权是指一国依靠海洋而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6]22}。马汉的海权理论是近代西方殖民活动的产物,因此其海权概念侧重于控制、力量和霸权,等同于作为军事术语的制海权。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国情并结合现时代世界海权发展现状,用具有合法性的海洋权力界定海权,比如师小琴认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萨姆·坦格里迪(Sam J. Tangredi)对海权的定义,即一国利用海洋资源、将军事力量投送到海上、控制海上冲突以及从海上对陆上事务施加影响的能力总和^{[7]9}。胡波认为海权是指一国在一定海洋空间内发挥政治、经济、外交及军事等影响的能力^{[8]20}。叶自成认为海权是指一国在海洋空间的能力和影响力^{[9]261}。沈伟烈认为海权是指一国使用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从海上包括其上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延伸的海洋利益以及对海洋活动的主体和其他政治实体意志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的总称^{[10]143}。倪乐雄认为海权是指一国运用军事力量对海洋的控制^[11]。石家铸认为中国海权就是中国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12]35}。上述定义接续了西方近代海权论把海权视为一种力量的看法,区别只是合法与非法而已。其次,从法权意义上将海权界定为海洋权利或海洋权益。张世平认为国际法视野下的海权就是海洋空间活动的自由权^{[13]211-215}。娄成武认为中国海权与海洋权益无异^[14]。再次,把海权概念视为由不同要素组合的复合概念。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包括海洋权利和海上力量两部分,其中海洋权利包括海洋权益^{[2]7}。孙璐认为中国海权包括海洋实力、海洋权益及海洋权力^[3]。史春林从海权的手段、内容、目的及本质出发,将海权定义为一国运用各种海上力量捍卫和发展海洋权益以确保

国家安全和利益,进而成为海洋强国^{[15]9-11}。

从各位学者对海权概念界定来看,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是各自的侧重点不同,没能形成统一的界定标准;二是把海权概念与海权观念相混淆,用观念代替概念,犯了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三是没能厘清中西海权的差异,难以凸显中国海权的特点。现代中国海权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维护海权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缺少的环节,因此作为种概念的海权其属概念应是权利,并且维护海洋权利自然内涵着海洋利益的实现,因此现代中国海权等同于包含了海洋权利与海洋利益两个基本要素的海洋权益,而海洋权力、海上力量及制海权皆是用以维护海洋权益的手段,自然不属于现代中国海权概念外延的一部分。海权概念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差异,现代中国海权既不同于西方海权观念,也与近代中国海权观念有别。中国海权观念产生于自鸦片战争起抵御外侮过程中对海洋控制和利用的自觉反思,这种反思呈现出由模糊到清晰、由片面到全面、由边缘到中心的嬗变历程,内容涉及对制海权的认识、海上力量的建设、海洋利益的实现及海洋权利的维护等,因此在探究晚清海权问题时,必须对所使用的海权具体内涵加以明确界定,否则就会因概念模糊不清而导致论题不清,甚至出现以现代海权概念去衡量晚清有无海权的无意义之举。

二、晚清海权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过去学界关于晚清海权问题研究集中在海权观念起源、海权发展的制约因素、典型人物的海权思想和实践、海权思想对海防成败影响以及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

(一)关于中国海权观念起源的研究

由于对海权概念界定不同,导致对中国海权观念起源时间的认定至少有四种不同观点:一是认为起源于鸦片战争前。高月认为中国近代海权意识滥觞于明代防倭之际,其后在抵御外侮时海权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16];二是认为起源于鸦片战争。李强华认为晚清海权意识萌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际,发展于甲午战争之后,对海权的认知视角经历了从军事、经济到法权的转变,海权实践经历了从制海权控制、海洋权利维护、海洋利益实现的嬗变历程^[17];三是认为起源于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后。周益锋认为只有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

后,中国才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观念,海权是控制海洋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而中国在马汉海权论传入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行动^[18]。皮明勇认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海权论的是中法战争时期驻德公使李凤苞翻译的《海战新义》,在此书翻译中首次使用了“海权”一词,此时海权论并未引起清廷上下足够的重视。甲午战争后,随着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传播,清廷开始产生经略海洋的新思想,确立海军重建的目标是争夺海权,开始了对海岛主权的重视^[19];四是认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后。石家庄以国际体系、海外贸易及海洋认知为提出海权的三个逻辑前提,认为中国明确提出海权概念应该在1978年以后,晚清时期只有海防而无海权^{[12]30-35}。总之,在判断晚清海权观念的起源必须注意两点:一是不能脱离近代世界海权观念产生的背景,也就是那个时代对海洋的全新认知和利用观念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对于中国而言,尽管明代嘉靖年间海疆安全受到倭患的威胁,但并未促使明政府对海洋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全新认知,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抵御外侮中被迫超越传统海洋观念重新审视海洋的价值和意义,海洋观念才开始萌发;二是中国海权观念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不能以西方海权论作为衡量尺度,因此不能把西方海权论的传入作为晚清海权观念产生的起点,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发展海洋贸易等思想已经表现出对制海权及保护海洋利益的朦胧认知,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使用“海权”一词,所以中国海权观念的产生要早于西方海权论的传入。

(二)关于晚清海权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

学者普遍认为晚清海权的嬗变过程是被动而曲折的,原因是受到来自主观客观多重因素的制约。马志荣认为导致明清两朝海权丧失的主要原因是重陆轻海与重农抑商的国策,重陆轻海意识导致缺乏经营海洋的战略意识,重农轻商使得中国在世界性海洋时代缺乏必要的竞争力^[20]。倪乐雄认为由于中国传统陆权观念与西方近代海权观念的错位,近代中国海军只是陆军水战队,这与西方近代海军的远洋进攻性质是背向而行的^[21]。李强华认为近代中国体制僵化、财政危机、装备落伍及观念束缚等因素制约了海权发展^[22]。周益锋认为尽管马汉海权论在中国的传播使得民众增强了对海洋、海军、海权的认识,形成了初步的西方

近代海权思想,但是中国并未通过建设强大海军成为世界海洋强国,其原因在于中国对海权论认识水平较低、海权论传播只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而未被清廷大多数官员所认可、清政府政局不稳以及缺乏足够的经费支撑^[18]。许华认为晚清海军建设缺少资本主义经济之源、政治之本且又以防御为目标,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决定了中国鸦片战争以降的海军建设与海权意识发展无关^[23]。总之,学者们对晚清海权发展制约因素分析得不无道理,但是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割裂了各制约因素的内在联系,缺乏对制约因素相互间影响的系统分析;第二,忽视了晚清在地缘、政治及经济发展方面与近代西方海洋强国的差异性,简单地套用西方近代海权概念加以比较;第三,缺乏对制约因素作主观与客观的区分,误把客观因素当作消极因素,事实上只有主观因素才能作积极与消极方面的评价。

(三)关于晚清典型人物海权思想的研究

学界研究晚清人物的海权思想主要集中在魏源、李鸿章、严复、孙中山等人身上,侧重于他们或者对晚清海权提出开创性的见解,如魏源;或者影响晚清海权发展进程,如李鸿章;或者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对海权有深刻的认知,如严复;或者把海权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的高度,如孙中山。

第一,关于魏源海权思想的研究

盛邦和认为魏源海权思想表现为主张发展海洋运输事业、倡导国际贸易、建立新式海军,思想发展的逻辑主线是由海运、海商、海军到海权^[24]。戚其章认为魏源海防论包含朴素的海权思想,内容包括创设近代海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以推进国内外贸易发展、扶植南洋华人垦殖以为藩镇,魏源海权思想比马汉海权论的提出大约早40年,魏源海权思想旨在抵御西方国家侵略,马汉海权论则为西方国家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二者目的有本质区别^[25]。刘中民认为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表明了近代国人海权意识开始觉醒,魏源认识到西方列强通过控制海洋以进行殖民扩张,西方列强能够控制海洋的原因是拥有坚船利炮以及训练有素的人才,其经济基础是发展海外贸易,因此魏源主张中国海上军事建设必须与民用经济相结合^[26]。李强华认为魏源试图通过发展海上运输业、发展国际贸易、加强海军建设、掌控制海权等途径使得中国成为足以抵御外

侮的“海国”，是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的具体体现^[27]。总之，魏源是基于对西方海权发展朦胧认知的基础上，第一次自觉而全方位地反思了晚清的海洋国防及海洋经济等价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尽管其主张并未引起清廷重视，但其不同于传统的海洋观念表征了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萌发。

第二，关于李鸿章海权思想的研究

李斌认为海权建设的集大成者是李鸿章，其海权实践主要表现在北洋海军、基地、领导中枢、人才等方面的设计^[28]。李强华认为李鸿章海权实践主要体现在发展海上运输、加强海上防御、建立强大海军等方面，李鸿章以追求军事力量、加强海防为目的，对于法权意义上的海洋权利之维护缺乏理性认知^[29]。刘中民认为李鸿章受到传统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影响，其海军战略的核心是以防御为目的，争夺制海权的思想也始终未被突出，其海军建设缺乏积极进取的战略思想^[30]^[83]。总之，由于魏源和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处阶层差异，学者对二者的要求也各异，对魏源海权思想的开创性褒多于贬，对李鸿章的海权实践贬多于褒。事实上关于海权思想和实践，应该把李鸿章个人与官僚集团区分开来，既不能把集体决策失误让李鸿章一人担负，也不能忽视李鸿章在视野上的局限性对集体决策的影响。

第三，关于严复海权思想的研究

王荣国认为严复是晚清较早接触和传播马汉海权论者并开启了20世纪初中国关于西方海权理论的讨论，严复认识到海权关系到国家强弱和国际地位高下，若无海权那么陆权也会丧失，必须通过重建海军、建设军港、建设海岸炮台及对海上进行交通控制来缔造海权^[31]。林怡认为严复是中国海军“教父”，甲午战后严复的海防建设主张是：购巨舰、固外封、建强权、消内患、保侨民、修海军，同时也看到了所需人才、军港根据地以及规划经办和筹款将会面对的困难，严复关于海军发展的筹划、海军人才的培养、对制海权的控制主张对当今我国强军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32]。李泽厚认为甲午战后严复的军事改革主张较为保守，在海军重建上强调“渐”变，严复尽管在理论上是先进和彻底的，但在现实政治主张中却比康、谭更要慎重和保守^[33]^[258]。上述研究缺乏对严复海权思想中所具有的国际化视野、世界竞争意识、时代变革意识、战略性眼光作深入的分析。

第四，关于孙中山海权思想的研究

史春林认为孙中山海权观内容包括：恢复中华海权、建设强大海军、开发利用海洋以巩固海权，其海权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把恢复和争取海权与国力兴衰联系起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海权意识，把海权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34]。赵书刚认为孙中山从维护国家主权的高度强调收复丧失的海权的重要性，重视海军建设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从战略上看到了海南岛的屏障意义并主张在此设置行省^[35]。李强华认为孙中山海权思想是近代中国海权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其海权观内容是恢复海权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加强海上军事力量建设以维护海权、发展海上实业以争取海权，孙中山对于海权与国家政治、经济、安全及社会进步的认知达到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36]。总之，对孙中山海权思想研究缺乏从其治国方略的视角加以把握，难以凸显其海权思想在20世纪初对中国海权发展的引领作用。

(四)关于晚清海权思想对海防成败之影响的研究

学界在总结晚清海防失败教训时，几乎把忽视制海权看作导致海防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的甚至认为是主要因素。艾克认为中法战争中马江海战失败的首要原因是“中国海权意识淡薄和战略思维落后，导致海军建设只是对西方炮舰政策的本能反应，而与海权发展无关，中法海军实力相差甚远导致战争失败”^[37]。戚其章认为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依然未能超越海岸守口主义窠臼，而日本却制定了夺取制海权及海陆统筹兼顾的战略方针。甲午战败表明了晚清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研究与掌握，制海权是影响这次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之一^[38]。鞠海龙认为中日近代在同样面临海洋危机的情况下，分别采取了加强海防和拓展海权两种不同的战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海防战略应对日本海权战略，其结果是中国地缘战略空间坍塌^[39]。许华认为甲午战争中日对海权的认识和践行方式不同决定了战争的胜败，海权观念发展的不同决定中日两国近代命运各异^[23]。总之，海权固然对战争有重要影响，但战争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等多方因素，过分夸大海权的影响而忽视其他因素，势必会陷入海权决定论的思维误区。

(五)关于晚清海洋权益维护的研究

随着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晚清政府开始自觉地运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李强华认为《万

国公法》的传入使得晚清开始学会利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实现海权维护从军事向法权的转变,具体表现在运用《万国公法》维护南沙、西沙群岛主权、划定渔业管辖范围以保护海疆主权^[40]。郭渊梳理了晚清政府对南海疆域的维护,具体内容包括运用《万国公法》的领海规定抨击日本兵船到朝鲜沿海水域的非法测量、以国际法原则为依据迫使普鲁士释放了在天津大沽口拿捕的丹麦商船、迫使日本将东沙岛归还中国、在西沙群岛树碑宣示主权、设立“水界”区和渔业区以维护海权^[41]。黄硕琳认为张謇主张的“渔权即海权”主张第一次从渔业角度认识海权,并通过渔业实业和海航、水产教育以维护海权^[42]。刘利民认为晚清在反对日本、德国等列强对中国的侵渔过程中形成了领海渔业权意识,并进而通过各种途径维护渔权,从而达到维护海权的目的^[43]。黄娟认为鸦片战争以降,晚清政府运用国际法处理外国船只侵犯中国海权,表明了国人从军事层面过渡到从政治管辖与经济利益角度理解海权^[44]。总之,学者们更多地关注晚清政府利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对海权的认知和实践也从以海防为目的拓展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研究缺乏从中外比较的视野下反思晚清海权维护在认知和策略上的不足,也忽视了对当今海权维护借鉴意义的挖掘。

三、晚清海权问题研究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30年来晚清海权问题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相关概念使用不一、研判标准唯西方化、现实意义阙如以及研究方法单一等不足之处。

(一) 缺乏对晚清海防与海权关系的厘清

过去学界一直没有对晚清海防与海权之间的关系加以厘清,导致在概念使用上存在用海防包含海权、海权包含海防以及把海防与海权外延看成全异关系的现象。晚清海防是在国家领海范围内为防备和抵抗东西方列强侵略以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属于国防战略的一部分。晚清海权涉及制海权控制、海洋利益实现、海洋权利维护等。从晚清海防与海权两个概念的外延关系看,二者属于交叉关系,其交集之处就是制海权。由于忽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研究过程中容易陷入以下误区:一是未经对海防与海权概念的明确界定,简单地把晚清海防

看作是中国海防战略与列强海权战略的对决,海防与海权既然在外延上是交叉关系而非全异关系,就不能并列使用;二是不能正确区分海防与海权,难以对晚清海军建设作出客观评价。学者们在对晚清海军建设评价时,几乎都认为在甲午战争前海军建设没有以争夺制海权为指导方针,结果导致甲午战败,直至甲午战争后才开启了在西方海权论指导下并以争夺制海权为目标的海军重建。争夺制海权只是海军实现海防目的的多种途径之一,而非必要条件,如果把是否坚持争夺制海权的方针作为评价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唯一标准,势必否定了甲午战前海军建设成就及其在海防中发挥的作用。

(二) 海权评价标准唯西方化与夸大海权的影响力

学界在晚清海权研究中,多是以西方海权思想为标尺去批评晚清缺乏对海权维护的重视、海军建设没有坚持以争夺制海权的指导方针,等等,有的甚至把历次海防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海权丧失。首先,在研究近代中国海权问题时,必须注意中西之别,西方近代以来所奉行的海权思想是侵略性的,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中国近代海权主要是以实现海洋防御和维护海洋正当权益为目的,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西方近代海权值得晚清借鉴的只能局限于在海防战争中如何利用制海权以实现有效海防的范畴。其次,不能因为海防失败就无限夸大制海权对海防成败的影响。海防是一个包括了武器装备、兵力、后勤保障、战略战术等诸多要素的体系,对制海权的掌控只是战略战术的一部分。部分学者认为是否重视海权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晚清以海防战略应对日本的海权战略决定了甲午中日战争结果,甲午战争诠释了海权与海防的本质区别及其决定性影响。以上判断都过分夸大了海权对晚清海防的影响,似乎表明以掌控制海权为目标的军事进攻就一定胜于防御,这种把战争简单地分为“防御和进攻”两种互相排斥的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进攻和防御只是战争过程中互为表里的两种手段。

(三) 缺乏对晚清海权研究现实意义的深入挖掘

尽管部分学者对晚清海权的成败得失究竟对当今我国海防建设、海洋争端问题处理、海洋意识培养以及海权发展战略制定有何启示予以了研

究,但还不够深入。学者们普遍把晚清海权问题对现实的启示归结为建立强大的海军、加强海洋意识的培养、注重海洋经济的发展等,并且多数都是以近代西方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马首是瞻。挖掘晚清海权问题对现实的启示意义,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就中西之别而言,如何根据中国陆海复合型地缘特征、具体国情以及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来选择中国特色的海权发展之路,而不是照搬某些西方海洋大国的海权发展经验,要汲取晚清海权发展留下的经验教训。二是就古今之分而言,明确新时代海军建设的指导方针、目标、任务及内容,正确定位海军在未来军事发展中的地位,因此要反思制约晚清海军发展的各种因素今天是否依然存在。三是当前我国与周边国家海洋权益争端不断加剧,晚清有识之士对海洋权益的认知及维护策略,比如张謇提出的“漁权即海权”、康有为重视南海侨民的保护、严复提出的“联各国之欢”的战略防御策略等,对今天解决海洋争端问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单一

过去学界关于晚清海权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略显单一。一方面,缺乏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学领域,缺少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使得研究往往局限于从一种回顾历史的后见之明作出判断,忽略了当时历史境况自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多维度特点,容易造成夸大特定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以偏概全的误读,如果能从多学科不同维度加以审视,可以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全面而客观。另一方面,缺乏深入的中外比较研究。尽管也有一些近代中日、中西海权比较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是以西方和日本海权发展之“正确”与中国海权发展之“不足”与“错误”相比较,所持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模式,缺乏对中国晚清海权有一个真切的研判。因此在进行中外近代海权比较中,亟须厘清影响中外海权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在比较中要以他国海权发展为鉴,但不能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否则对晚清海权的评价极容易滑向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难以在“客观的批评”与“同情的理解”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再一方面,缺乏最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学界普遍运用文献研究和史料批评方法以归纳、整理和分析主要历史事件脉络和历史人物的海权战略决策,缺乏

运用博奕论、反事实条件推理论等方法对于晚清海权战略决策进行合理性的验证。

四、晚清海权问题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于晚清海权问题的研究,未来需要在战略环境对海权战略制定的影响、晚清海权战略决策过程的重构、研究方法拓展以及晚清海权现实意义的挖掘等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

(一)探究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晚清海权战略制定的影响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为战争的目的而对作战的使用,正是通过战略这一层面,军事活动才超出了单纯的暴力对抗而成为有意图的国家行为。事实上,军事战略从来都是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经过反复争论而得以制定的,导致战略环境不确定性的因素包括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化、激烈竞争的国内政治决策过程以及不断变化的军事技术。以之为参照不难发现,晚清海权战略的制定处于更大的战略不确定性环境当中,四重转型加剧了这种不确定性:战略文化上,从长期形成的以陆权为主的战略文化传统向海权战略转型;国际关系上,从天下朝贡体制向现代国际关系转型;国家体制上,从传统君主官僚制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军事技术上,从木制风帆战船向铁甲舰开启的巨舰大炮时代转型。在探究晚清海权战略制定时,必须全面考量上述因素的影响,方能厘清晚清海权战略嬗变的逻辑并给以客观的评价。

(二)重构晚清海权战略的决策过程

研究晚清海权战略必须围绕军事战略的不同环节以重构其决策过程。首先,要尽可能地摆脱由历史的后见之明所造成的偏见,认识到和任何其他时期一样,晚清海权战略的决策者们同样会受到文化、制度、资源和技术手段上的约束,诸如文化视域的局限、收集情报信息的困难、可供选择手段的多样性以及事件过程的突发性等。其次,必须坚持战略问题的总体视角,将晚清海权战略决策者们对国际关系的判断、卷入的国内政治竞争和对军事技术发展的认知梳理清楚,摆放到位,而不是割裂它们的内在联系,草率地作出判断。由此才能返回历史的具体情境,对晚清政要们争论、制定海权战略的决策过程进行符合历史事实的重构,厘清在四重转型放大的不确定性环境中晚清政要们进行决策的依据和论证。只有基于这种历史移情式的重构,才能进一步借助反事实条

件推理、博弈论等理性决策手段,研判其战略得失,发掘其深层次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

(三) 以“过程—事件”分析法研究核心论题

在人物众多、事件芜杂的历史过程中重构晚清海权战略形成与发展的清晰脉络,就必须始终围绕核心论题,以“事件—过程”的方式展开分析。核心论题包括但不限于:同治十三年(1875年)以来历次海防政策的辩论;北洋水师建设当中涉及到的经费、指挥、训练、后勤、技术、通讯等问题;海军技战术的发展和陆海协同训练、作战等问题;甲午战争的主要战事活动与决策等。进行“事件—过程”分析需要注意两点:一是战略问题的多层次性和战略环境的不确定性本身就意味着战略决策从来就不是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一劳永逸地制定出来的,而总是卷入到历史人物之间反复的争论、妥协、试错和调整过程当中;二是围绕主要的事件,过程本身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包括时间节点、事件顺序、突发情况等,都可能影响当事人的判断和决策而对最终的结果造成重大影响。只有尽可能地将晚清历史人物的海权战略决策放进这一“事件—过程”分析当中,才能对其观点的形成及演变得出恰如其分的“还原”,从而对晚清海权战略决策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评判。

(四) 汲取晚清海权战略成败的经验教训

晚清海权战略根本局限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晚清海军建设完全由政治精英所主导,缺乏来自于工商业阶层为主体的社会持续支持。第二,晚清海军建设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保护的恰恰是传统的社会和政治控制机制,这不仅割裂了海权观念与国家战略的有机关联,更造成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根本对立,既要向外学习现代科学和军事技术,又要防范它对传统政治体制的侵蚀和冲击。第三,把防御作为一种被动应对危机的方式,也就决定了晚清政要们对海权问题的关注主要服从“危机——反应”的模式,即一旦海疆发生紧迫的外交、军事危机就开始重视海防和海军建设问题,随着危机的暂时解除,注意力就会渐渐转向其他政策问题,海防和海军建设问题则被相对淡化。总之,任何国家在其任何历史时期制定军事战略也都必然受到诸如地缘政治、国防战略、国际环境和资源等条件的约束。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近代覆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势必要根据中国地缘特征,平衡好陆权与海权发展的关系,正确定位未来海军发展的方向,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

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消除影响海权发展的消极因素,在此过程中依然要面临海权的“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当今关于中国海权概念界定、海权发展限度、陆海权统筹等问题的争论表明了晚清以来的海权问题在中国的嬗变并未终结其历史,就此而言,晚清海权战略的得失成败必将会为未来中国海权发展提供历史之镜鉴。

参考文献:

- [1] 史春林. 1990年以来中国近代海权问题研究述评 [J]. 史学月刊, 2009(1).
- [2] 张文木. 论中国海权 [M].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0.
- [3] 孙璐. 中国海权内涵探讨 [J]. 太平洋学报, 2005(10).
- [4] 张序三. 海军大辞典 [Z].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3.
- [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编辑部. 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15卷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 [6]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海权论 [M]. 范利鸿, 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7] 师小琴. 论海权与中美关系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
- [8] 胡波. 中国海权策、外交、海洋经济及海上力量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2.
- [9] 叶自成. 陆权发展与大国兴衰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
- [10] 沈伟烈. 地缘政治学概论 [M]. 北京: 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5.
- [11] 倪乐雄. 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7(11).
- [12] 石家铸. 海权与中国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8.
- [13] 张世平. 中国海权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 [14] 娄成武. 海权、海洋权利与海洋权益概念辨析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 [15] 史春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海权概念与内涵研究述评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2).
- [16] 高月. 近代海权思想浅析 [J]. 浙江学刊, 2013, (6).
- [17] 李强华. 观念史视角下的中国近代海权观念嬗变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
- [18] 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J]. 史学月刊, 2006(4).

- [19] 皮明勇. 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J]. 近代史研究, 1994(2).
- [20] 马志荣. 海洋意识重塑: 中国海权迷失的现代思考[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3).
- [21] 倪乐雄. 文明转型与中国近代海权的困境——难以抗拒的历史性落后[J]. 国际观察, 2013(2).
- [22] 李强华. 晚清海防战略的嬗变历程及其制约因素[J].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5).
- [23] 许华. 海权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8(5).
- [24] 盛邦和. 海运、海商、海军、海权——魏源世界意识中的海国理念[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6).
- [25] 戚其章. 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J]. 求索, 1996(2).
- [26] 刘中民. 中国近代海权思想的先声——魏源的海防思想[J]. 海洋世界, 2009(5).
- [27] 李强华. 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觉醒视角的魏源海国理念探究[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2(5).
- [28] 李斌. 李鸿章与晚清海权[J]. 历史教学问题, 1994(6).
- [29] 李强华. 晚清海权意识的感性觉醒与理性匮乏: 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考察[J]. 广西社会科学, 2011(4).
- [30] 刘中民.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6.
- [31] 王荣国. 严复海权思想初探[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
- [32] 林怡. 严复在中国海军史上的地位及其海防理念[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5(2).
- [33]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34] 史春林. 孙中山海权观评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3).
- [35] 赵书刚. 孙中山的海权观[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 [36] 李强华.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孙中山海权思想探析[J]. 太平洋学报, 2011(12).
- [37] 艾克. 海权视角下马江海战致败因素分析及其现实启示[J]. 学术界, 2014(10).
- [38] 戚其章. 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J]. 江海学刊, 2002(4).
- [39] 鞠海龙. 晚清海防与近代日本海权之战略比较[J]. 中州学刊, 2008(1).
- [40] 李强华. 中国近代海权观嬗变: 以《万国公法》传入为中心的考察[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4).
- [41] 郭渊. 列强对南海疆域的侵略与晚清政府的海权维护[J]. 中州学刊, 2008(1).
- [42] 黄硕琳. 渔权即海权[J]. 中国法学, 2012(6).
- [43] 刘利民. 清末社会维护领海渔业权活动考察[J]. 晋阳学刊, 2015(4).
- [44] 黄娟. 中国近代“海权”概念的形成及演变探析[J]. 科学·经济·社会, 2015(2).

Research Review of Sea Power Problem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ince the 1990s

LI Qianghua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academic circles'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sea pow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s focused on the evolution process, constraint elements, impact on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astal defense, and sea power thoughts and practices of typical figures. While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comings, such as vague topics, excessively westernized research standards, single research method and insufficient concern for the reality.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on the problems of sea powe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crossover research methods, reconstruct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sea power strate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context of “Four Transformations”,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core topics with the analysis method of “process—event”, and explore deeply the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of success and failure of sea power strateg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ea power in China.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ea power; 1990s; review

(责任编辑 雪 簪)